

论宋朝保州地区的军事防御举措

王晓龙, 杜敬红

(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2)

摘要:北宋时期,保州地处宋辽边境,北接广信军、安肃军,南抵祁州、永宁军,特殊的地理位置,使仅辖一县(清苑)的保州成为宋朝北部边防不可忽视的重镇。为了维护边境安全,防御辽朝侵袭,宋政府精选能臣良将出任保州地方官,并在这一地区设置缘边巡检司,以提高保州与相邻州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并采取扩修城池、广开屯田、连通塘泊、广植桑榆等一系列措施来加强保州地区的防御力量。通过诸多举措,使得保州地区成为宋朝河北边防体系中重要的环节之一,为维护宋朝国防安全、抑制辽军南侵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宋朝;辽朝;保州;军事防御;武臣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3)03-0052-08

公元916年,辽朝建国,960年,太祖赵匡胤代周建宋,自此出现了长达160余年的宋辽共存时期。在这160余年中,宋辽之间经历了战争、对峙、和平交往等往复的循环态势。宋建国之前,幽云十六州已在辽的控制范围,宋辽之间,相隔的是一马平川之平原,而辽以骑射立国,故宋人称“自蓟之南,直视千里,贼鼓而前,如堯旌上行”^[1]卷一七四,皇祐五年正月壬戌,P4195。而“由顺安、安肃、保、定州界,自边吴淀望赵旷川、长城口,乃契丹出入要害之地”^[1]卷一百十二,明道元年八月壬午,P2608。故“宋之防务,着重霸州以西至保州、安肃、广信军一带”^[2]。保州地区(辖区涵盖今河北省保定市区及清苑、满城部分地区)成为河北防御部署的重要区域。

以往学界论述河北边防问题多是将其视为整体区域进行考察,未有以保州单一区域为切入点的文章^①。实际上,保州位于宋辽边界,是宋辽战争的前沿阵地之一,对北宋时期保州地区军事防御举措进行单独考察,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宋政府对辽防御的具体战略构建,加深对宋辽关系史及宋朝军事史、区域史的研究和认识。

一、精选能臣良将驻守保州

保州等缘边州军是边防重地,其州军长官在边境管理与宋辽外交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因而,宋朝政府

收稿日期:2013-02-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宋代地方政府行政成本问题的历史考察研究”(10CZS014)

作者简介:王晓龙(1977-),男,河北石家庄人,研究员,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宋代政治制度史、法制史研究。

^①如高恩泽《北宋时期河北“水长城”考略》(《河北学刊》1983年第4期)、李克武《关于北宋河北塘泺问题》(《中州学刊》1987年第4期)、杨军《北宋时期的河北塘泊》(《侯仁之师九十寿辰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学苑出版社,2003年)、程民生《北宋河北塘泊的国防与经济作用》(《河北学刊》1985年第5期)等文章对河北地区的塘泊问题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探讨与研究,其中均提及保州的河渠、屯田等情况,但未详细予以说明。林瑞翰《北宋之边防》,《宋史研究集》(第十三辑),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81年,立足于整个河北地区,认为保州、安肃、广信地区是北宋防御的重点。马励《北宋在对辽战争期间的河北边防》,《史绎》1973年第10期,则是从地理位置、河北路的设置、实行塘泺、屯田、组织民众等方面,对河北边防进行了宏观把握。王轶英《北宋澶渊之盟前的河北军事防御区域》,《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对太祖、太宗、真宗时期的河北军事防御布局进行了详细论述,指出霸州以西至保州、安肃、广信军一带为宋对辽的第一道防线。

赋予缘边州军知州很大的行动自主权,知州、通判既听命于所辖路之安抚司,又直接受命于中央政府,遇有要事可直奏朝廷。保州,作为宋辽交界之沿边州军之一,与安肃军、广信军互成犄角,遇有战事,三州互相支援,进可攻,退可守,故保州官员的择选备受宋政府的关注与重视。

1. 选良将任知州之职

知州是一州的最高长官,管理州军的主要事务,宋建国之后,为防范武将专权和地方割据,集地方权力于中央,故规定以文臣出任地方知州,“以权设之名,为经常之任矣”^{[3]卷九《知州》,P524}。因沿边州军地处边境,除了要管理本州军内部事务外,还要肩负着对外作战、维护边疆稳定的职责。因而,为了保障边境的安全,及时防范辽军南侵,沿边知州的选任不同于他处,多以武臣充任,除负责州内的赋役、狱讼、户口等事务外,并有处理边境纷争、商度宋辽往还文牒的职能。

具体到保州知州的择选上,宋政府投入了很大的精力,注重以良将充任保州知州,故知保州者多为能征善战、有勇有谋之武将,如杨延昭、杨嗣等人曾多次驻守保州,皆以善战闻名于宋辽。太宗淳化二年(991年),杨嗣知保州,“门无私谒”,转运使言其治状优^{[4]卷二百六十《杨嗣传》,P9017}。后因将才出众,曾长期驻守保州,拱卫边防^①。真宗咸平二年(999年),辽军率万军南侵,杨嗣与先锋田绍斌、石普“逆击,败之于廉良路”^{[5]蕃夷一之二三,P7670}。淳化三年(992年)至四年(993年),李继宣知保州,在这不足一年的时间中,李继宣多次巩固保州城防,“筑城关”、“修外濠”、“葺营舍”,政绩显著^{[4]卷三百八《李继宣传》,P10146}。澶渊之盟后,宋政府开始由之前的重视武备转为防御护城、保境安民为主。如景德二年(1005年)正月,宋真宗选“宜得武干善镇静者”镇守河北沿边州军,以杨延昭知保州^{[1]卷五十九,景德二年春正月乙卯,P1308},与顺安军石普、威虏军魏能、北平田敏互为犄角^{[4]卷三百八,《李继宣传》,P10146}。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刘几任保州知州,“治状为河北第一”^{[4]卷二百六十二《刘几传》,P9076}。正是择选条件的严苛,才保证了保州官员多为有才干者,他们政绩显著,为维护保州地区安居乐业和边境安稳做出了重要贡献。

2. 以有才能的京朝官充任保州通判

通判,太祖初置时寓“监郡”之意,乾德四年(966年)十一月,规定凡本州公事,须通判与知州同签署才可生效^{[1]卷七,景德四年十一月乙未,P181}。由于缘边州军多以武臣充任知州,知州与通判皆可参与处理对辽的文书往来事务,而武臣知州在与辽的交往与交涉时常缺乏周旋之举,“词理多缪”^{[1]卷六十七,景德四年十一月甲申,P1508},如杨嗣知保州,“以武人治郡,不屑细务”^{[4]卷二百六十《杨嗣传》,P9017}。故宋朝多次下令诏以有文学才能之人通判保州,以协助知州处理州军事务。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十月,“命申官院择京朝官有才干、举进士者通判保州,以其密迹边境”^{[1]卷六十七,景德四年十一月甲申,P1435}。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二月,河北缘边安抚都监张炎成言:“雄、霸、广信、安肃军、保州五处最是穷边,内保州、雄州、广信军凡承受北界公牒,演用文字回报,须略言典故。乞自今吏部铨选进士及第有公器者充判官或推官,凡有往来公牒,专令相度回答。”^{[5]职官四八之七,P3459}以文臣通判补武臣知州之不足,文臣通判与武臣知州相配合,既可在处理州军事务时相互配合,又可在与辽的外交事务中做到文武配合,相得益彰。

3. 严格择选县尉官

县尉,“掌部辖弓手、兵士巡警,捕盗解送县狱,维持一县治安”。澶渊之盟后,宋辽以白沟河为界,尽管维持了百余年的和平局面,但在沿边地区时常会有小摩擦及冲突发生,解决这些摩擦和冲突仅靠知州、通判是不够的,还须其他州县官员的协助与配合,以分担知州、通判的繁重政务,共同维持边境安稳与和平局面。

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因辽朝盗贼多次越界到宋朝边境诸州扰民滋事,故令定州路安抚司权举使臣,充任保州保塞、定州北平、曲阳、唐县等地县尉^{[1]卷二百八十二,熙宁十年五月乙卯,P6902},以维护保州地区的边防安全。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提举河北路保甲司言:“诸县尉通管县事外,惟主捕县城及草市内贼盗,乡村并责

^①据李之亮《宋河北河东大郡守臣易替考》,从淳化二年(991年)至咸平四年(1001年)中,除李继宣在淳化三年至四年中短期知保州外,其余均为杨嗣知保州。

巡检管勾,缘边把截控扼巡检兵级并依旧。……保州保塞、遂城、安肃军……逼近边界,旧以使臣为尉,其职与内地不同,乡村盗贼恐难一例专责巡检。欲并令尉依旧条,惟不干预教阅。”^[1]卷三百二十四,元丰五年三月己酉,P7810至此,保州、安肃军等地县尉重掌捕捉贼盗、治安职能,既减轻了知州、通判的负担,又可将宋辽边境纷争限于地方事务中,降低了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对维持宋辽和平局面有很大的益处。

4. 置保州缘边都巡检司

宋初,宋廷为了防范辽朝的进攻,除了屯重兵于镇、定、高阳关外,亦在保州、广信军等处设置缘边都巡检司一职。以保州为治所,隶定州路。

设立保州缘边巡检司的目的是“内则屏蔽王畿,外张三路之援”^[6]前集卷十六上,《边防》,第726册,P471。既拱卫京都,又有效调度沿边相邻州军的军队,使其互相支援。保州缘边巡检使多由知州兼任,并设副使两名,共同负责警备保州、广信军、安肃军,并按规定每月巡视各州之间^[5]职官四八之一二七,P3519,以防范辽军来袭。保州“自界首自广信军三十五里”、“自界首至安肃军三十五里”^[7]卷二,P86-87,三州军呈犄角之势,发挥地缘优势,互相配合,协同作战。

保州缘边都巡检不仅肩负着互相支持的重任,还有保卫州军、捕捉贼盗等一般都巡检的职责。史书明确记载了巡检司在防范贼侵方面的作用:“缘边巡检杨延朗止令在保州,遣同巡检往来巡警,如有群盗,会兵剪戮,即率麾下往赴。”^[1]卷五十九,景德二年春正月甲寅,P1309这样保州缘边都巡检司具有了保边、调度军队的双重职责,所掌职权更为宽泛、全面,既可御敌又能打击贼盗,以最大限度保证沿边州军的安全。

有学者认为:“缘边都巡检使实际上是河北沿边战区的总指挥官,有利于避免各城寨孤军作战而分散兵力和自顾不暇只能守城而不能出战迎敌情况的发生。”^[8]虽然这一看法并不全面准确,但却说明缘边都巡检司的重要地位。保州缘边都巡检司管辖保州、广信、安肃等极边州军^[1]卷一百三十七,庆历二年九月乙巳,P3290,统辖军队包括云翼、无敌、招收等。又因厢兵威边“惟保州教战射,隶巡检司”^[4]卷一百八十七,《兵一》,P4593,故保州巡检司实际所辖军队概已逾万人,在防御贼寇、抗击辽军方面起到很大的镇慑作用,因此才有大臣言“惟保州沿边巡检并雄、霸州、沧州界河二司兵马,国初以来,拓边最号强劲”^[4]卷一百九十六,《兵十》,P4897。

二、沟通塘泺、大兴屯田、种植桑榆,构建“水上长城”

河北边境千里,塘水居其八,有滹沱河、永济河、徐河等多条河流流经,境内有边吴淀、齐女淀、劳淀等塘水。宋廷正是利用该地多河渠、塘泊的特点,在缘边地区以屯田为名,疏通塘泊,使其互通相连,并辅以种植桑榆之策,以达限制辽骑之效。

宋朝最早系统地提出以塘泺、河渠来防御辽军,实行屯田措施的是何承矩。太宗端拱元年(988年),沧州节度副使何承矩上疏朝廷:“若于顺安寨西开易河浦口,引水东注至海,……滋其陂泽,可以筑堤贮水为屯田,以助要害,……塘注关南诸泊淀水,播作稻田,其缘边州军地临塘水者,止留壮城军士,不烦发兵广戍。收水田以实边,设险固防塞,春夏课农,秋冬备寇。”^[9]卷一百五,《上太宗论塘泊屯田之利》,P1130何承矩的奏疏道出了修建“水上长城”^①的目的:一是限制辽骑、盗寇;二是减少戍卒;三是储备军粮。而吕蒙正等人认为修筑塘泊“动众劳费,恐无所剩”^[1]卷五十一,咸平五年夏四月乙酉,P1126,故此议暂且搁置。后因宋辽关系及战事的变化,宋朝政府再次将此议题纳入河北地区的防御部署。

1. 大兴屯田

鉴于国防安全的重要性,宋朝政府开始逐步在沿边地区推行屯田之策,以限制辽骑的进攻。端拱二年(989年),宋太宗诏“缘边作方田,颁条置量地里之远近,列置寨栅”^[10]卷三百四十六,《四裔考二十三》,P9594,以限戎马。淳化四年(993年),太宗置河北缘边屯田事,“督戍兵万八千人,自霸州界引滹沱水灌稻为屯田”^[4]卷九十五,《河渠五》,P2364,由此疏通塘泺、广泛屯田之役兴起。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顺安军、威虏军、保州、定州皆有屯田”^[10]卷七,《田赋考七》,P164,由知州军管勾屯田事,旧兼使者仍旧。

^①“水上长城”的说法来源于高恩泽的《北宋时期河北“水长城”考略》,因赞同其观点,故引用之。

真宗时对于保州地区屯田之事尤为重视。景德元年(1004年)三月,令威虏、静戎、顺安军、北平寨、保州“广开方田以拒戎骑”^{[5]兵八之一二, P6893}。真宗以“保州屯田,渐见功绪。……但治田兵夫,多为转运司移易他使,故未能集事耳”为由,在保州专设屯田兵籍,以保障保州屯田工作的稳定进行^{[1]卷五十六,景德元年夏四月辛未, P1234}。景德三年(1006年),保州知州赵彬“请于州城东北,更广屯田”,真宗以违背宋辽盟约为由,未允^{[1]卷六十四,景德三年十二月己卯, P1435}。但这并不表示真宗反对屯田,而是碍于澶渊之盟中有要求宋辽双方城池要“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1]卷一百三十七,景德元年十二月辛丑, P3293}之语,真宗由公开倡导转变为暗中支持。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保州知州赵彬再次奏请,请增保州屯田务兵五百人,从之^{[1]卷七十一,大中祥符二年六月辛卯, P1610}。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改定州、保州、顺安军营田务为屯田务^①。

宋代地方官员更是将屯田作为限辽的重要举措。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三月十七日,知成德军刘平上疏,以安肃、广信军并保州之间相距三四十里,无关隘防御,乞请在保州以西作方田^{[5]兵二七之二五, P7245}。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缘边安抚使王临曾上疏,请于保州塘泺西部“引水种稻,为方田作沟,以限戎马”^{[10]卷三百四十六,《四裔考二十三》, P9607}。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河北安抚副使沈披奏请“赐度僧牒五百,治保州东南边缘陆地水田”^{[1]卷二百六十二,熙宁八年夏四月甲申, P6408},从之,并“给祠部五百道货易钱买农具、牛畜、舟车,兴治保州以东、次边陆地水田”^{[5]食货四之三, P4847}。由此可见,不论是宋朝统治者,还是河北安抚使、保州知州,均重视保州地区兴治屯田之事,保州屯田工作一直保持着稳定的进程,屯田面积不断扩大。

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命韩绛经制水塘,知保州张利一管勾、薛向提举,“置保州东杨村淤下地,种稻作塘陂,扼西山路”^{[1]卷二百九十三,元丰元年冬十月壬寅, P7146},元丰二年(1079年),因“(韩)绛言恐敌疑增塘泺”,故改保州屯田司为水利司。但元丰二年之后的史料中,仍称屯田务、屯田司,未见水利司之语,可见改成水利司之名只是为了避免与辽朝引起外交纠纷,在实际政务处理中仍由屯田司主管屯田事宜。

宋朝政府不仅积极支持缘边州军开疆扩土广泛屯田,更是明确奖惩措施。如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保州知州卢鉴因拓展屯田,岁收稻米一万八千或两万石,受到宋朝政府嘉奖^{[5]食货四之二, P4847}。仁宗天圣七年(1029年),诏“河北盗决屯田堰岸者,从盗决堤防律,再犯者送河南州军编管”^{[1]卷一百八,天圣七年十二月丁酉, P2528},将屯田纳入法律范围,对破坏屯田者处以流配之重刑。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河北屯田司上奏:“保州闭北齐水口,居民张用、张吉、张澄鸣鼓集众遮止,乞流配”,后三人被发配至淮南等地^{[1]卷二百十八,熙宁三年十二月丁丑, P5307}。哲宗元符元年(1098年),河北屯田司奏请“屯田务兵士犯罪,并依重役军人法施行”,从之^{[1]卷四百九十四,元符元年二月庚辰, P11741}。

屯田工作在缘边地区取得不错的成绩,尤其是保州的屯田效果显著。天禧末年,诸州屯田总数达四千二百余顷,其中“河北屯田岁收二万九千四百余石,保州最多,逾其半焉”^{[4]卷九十五,《河渠五》, P2366}。这些屯田稻谷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河北地区的军粮问题,起到了养兵之效。但《宋史》中又有“河北者虽有其实,而岁入无几”之语,认为河北地区屯田只是“利在蓄水,以限辽骑而已”^{[4]卷一百七十六,《食货上四》, P2366}。至于缘何有此评价,未有史料说明。但有一点是不能否认的,兴屯田,扼辽骑,成为河北军事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 沟通塘泺

塘泺^②,是由沟渠、河泊、水泽、水田等所构成的一种水网的总称,是北宋在河北地区建设的一种特殊的国防工程^[11]。《宋史·河渠志》在开篇便道出塘泺之用途:“塘泺,缘边诸水所聚,因以限辽。”^{[4]卷九十五,《河渠五》, P2366}因此对塘泺的建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其制曰:“若干地浅若干尺,若干地掘而浚之,若干尺相错如绣。是谓深不可度马,浅不可载舟也。”^{[12]卷四四,《御戎论》, P329}并规定河北屯田司每季度均要向工部汇报塘水深度。

^①在宋代“营田”与“屯田”的概念有所趋同,参见翟麦玲、谢丽著《辨析唐代的屯田与营田》,载于《中国农史》2008年第1期。

^②因论述河北塘泺的文章诸多,如杨军《北宋时期的河北塘泺》,《侯仁之师九十寿辰纪念文集》,学苑出版社,2003年;程民生《北宋河北塘泺的国防与经济作用》,《河北学刊》1985年第5期;李克武《关于北宋河北塘泺问题》,《中州学刊》1987年第4期;阎沁恒《北宋对辽塘泺设施之研究》,《国立政治大学学报》等文章已详细论述了河北塘泺的规模、作用,故本文不再一一赘述。此处仅从保州地区的塘泺、河渠入手,来说明保州地区的塘泺防御举措。

北宋为了保证保州地区的物资供应与联系,于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年)“遣八作使郝守浚等分行河道,抵于故境,皆疏导之”,后又“于清苑界开徐河、鸡距泉五十里入白河”,利用缘边塘泺来打通漕运通道,运送军粮物资,自此“关南之漕悉通济焉”^[4]卷九十五,《河渠五》,P2358。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保州知州赵彬奏请“决鸡距泉,自州西至满城县,又分徐河水南流以注运渠,置水陆屯田”,自此“舟行无滞”^[1]卷五十五,咸平六年九月庚辰,P1215。保州西到满城、广信军的漕运疏通,为“水上长城”的构建提供了有利条件。

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河北西路察访使沈括上疏:“相度得保州西至九顷塘度七里以来,及保州东阳村堤以东至臧村堤度三十里,庆历中皆曾筑堤壅水,遗迹尚存,若少加补完,西纳曹、鲍诸水,则杜城以东塘险相属”^[1]卷二百六十,熙宁八年八月癸巳,P6349-6350,阎士良奉命考察后,认为沈括之建议可行,“若增接修完,枢蓄诸河,以成险阻,委实便利”^[1]卷二百六十,熙宁八年八月癸巳,P6349-6350。熙宁年间,在宋政府的支持下,又开徐村、柳庄等地塘泊,沟通徐河、鲍河等,并以鸡距、五眼等泉为源,东合滹沱河、漳河、淇河、易水、涑水等河渠,融汇交通。于是“自保州西北沉远泺,东尽沧州泥枯海口,几八百里,悉为滹滹”^[13]卷一三《权智》,P394,自此保州地区的鸡距泉、徐河、漕河与沈苑泊、西塘水同周边塘泊相连。

有学者将河北塘泊区域的划分为九处,保州地区便有三处^[14]。分别为:“东起顺安军,西边吴淀,至保州,合齐安淀、宜子淀、劳淀为一水,衡广三十里,纵百五十里,其深一丈三尺或一丈。”“起安肃、广信军之南,保州西北,畜沈苑河为塘,衡广二十里,纵十里,其深五尺,浅或三尺,曰沈苑泊”。“自保州西合鸡距泉,尝为稻、方田,衡广十里,其深五尺至三尺,曰西塘泊”^[1]卷一百一十二,明道二年春三月丁卯,P2607-2608。三处塘泊皆以保州为关节点,将广信军、安肃军相连,保州以漕河、徐河连接广信军、安肃军,以沈水、边吴淀通顺安军,三州军既可由水路运物资、兵卒,相互支持配合,又可利用塘泊之利,据城为守。因塘水阻隔,三州军变得易守难攻,“以兵控扼之,则虏骑无以过矣”^[1]卷一百五十,庆历四年六月戊午,P3648。

尽管宋朝政府以屯田为名对河渠、塘泊进行改造,但营建塘泊防御之举仍引起了辽朝的警觉,辽朝多次对宋开凿塘泊表示不满。如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三月,辽朝派使臣萧英、刘六符求关南十县时指责宋政府:“营筑长堤,填塞要路,开决塘水,添置边军,既稔猜疑,虑隳信睦。”^[15]卷十,P248后又以“一苇可杭,投楫可平”^[1]卷一百三十五,庆历二年夏四月庚辰,P3235之语来讽刺宋朝的塘泊防御举措,故时有议者“请涸其地以养兵”,而王拱辰认为:“设险守国,先王不废,且祖宗所以限辽骑也。”帝深以为然^[4]卷九十五,《河渠五》,P2361。故庆历五年(1045年)七月初,宋辽约定罢两界塘淀,“约既定,朝廷重生事。自是每边臣言利害,虽听许,必戒之以毋张皇,使契丹有词”^[1]卷一百五十六,庆历五年秋七月壬子,P3793。

虽塘泺工程“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失去燕云带来的地形上的弱势,在秋冬枯水、封冻季节,辽骑兵南下并不可能受到很大的阻碍”^[16]。但该防御工程将大片的塘水、河渠相连,将辽军南侵的通道减少到三条,辽只能从西边无塘泺处、东边水浅处或通道而入^[17],“作为较为有效的战略防御设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屏卫中原的作用”^[18]。塘泊防御工程是阻滞辽军南侵的措施之一,在限辽方面起到的作用是无法忽视的,我们应肯定其防御的主要作用。

3. 广植桑榆

宋朝保州位置特殊,保州以东皆塘水,加之宋朝政府大兴屯田、广筑塘泊,辽军很少选择从保州东侵入;而保州以西,无天险屏障可依,辽军南下,常以骑兵为主,故多数情况下取此路南侵。因此,宋朝政府除在保州西部布以重兵外,亦在道路、空地等便捷通行处广种桑榆,以期阻滞辽骑的进攻。

宋太祖在建国之初便开始以桑榆之林阻滞敌军,“于瓦桥一带南北分界之所专植榆柳,中通一径,仅能容一骑”^[19]后录卷一。后宋朝政府更是多次下诏令河北地区广种林木。如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令河北缘边官道左右及时植榆柳”^[1]卷七十九,大中祥符五年十一月庚申,P1806。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河北缘边安抚司言“于缘边军城种柳树蒔麻,以备边用”,诏奖之^[1]卷八十二,大中祥符七年六月乙丑,P1880。但天禧二年(1018年),河北缘边安抚副使张昭远中辽人离间之计,上奏朝廷,认为保州等处所种榆柳“藏避逃军,亦尝杀害看守士兵”,又缘边寨栅多种此树,恐影响边防稳定,故请砍伐,从之^[5]兵二七之二八至二九,P7246-7247。宋政府明白中计之后,遂恢复禁止采

伐之令,诏“河北堤塘及所在闲田中官所种林木,毋辄有采伐,违者置其罪”^{[5]兵二七之二八,P7246}。此后亦多次重申桑榆之令。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河北缘边安抚使请自保州以西无塘水处,广植林木,异时以限敌马,从之”^{[1]卷一百六十七,皇祐元年冬十月戊戌寅,P4019}。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宋朝政府命保州塘泊以西筑堤植木九十里^{[10]卷六,《田赋考六》,P144},并“官计其活茂多寡,得差减在户租数,活不及数者罚,责之补种”^{[4]卷一百七十三,《食货上一》,P2372}。神宗时期,明确规定了保州、广信、安肃等地区的桑榆之法。熙宁六年(1073年)诏^{[1]卷二百四十六,熙宁六年秋七月庚午,P5987}:

安肃、广信、顺安军、保州人户地内,令自植桑榆或所宜之木,官为立劝课之法:每三株青活,破官米一开,计每户岁输官之物,以实估准折,不尽之数,以待次年。如遇灾伤,放税及五分以上,即以准折未尽米数等第济接。仍据逐户内合栽之数,每岁二月终以前点检及一分青活,至十年周遍。如不及一分,即量罪罚赎,勤令补种。令佐得替,转运司差不干碍官点检,以一任合栽之数,纽为十分,如及十分者有赏,不及七分者有罚。其所栽植之木,令人户为主,非时毋得遣人下乡,以点检为名,以致骚扰。委转运司施行,应昨所差管勾提举官并罢。

该诏将保州、安肃等地区所植桑榆纳入课税范围,要求所植榆柳“不及一分”之处“量罪罚赎,勤令补种”,官员一任中负责桑榆数“及十分者有赏,不及七分者有罚”,以鼓励缘边地区广种桑榆林木。自此,种植、管理林木成为保州地区的一项长期活动,直至元丰八年(1085年)十二月罢裁桑法。保州等处的桑榆树木与河北其他地区的防御林一起构筑成宋朝边境上阻滞辽军的一道重要军事屏障,并在宋朝防御体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致辽骑南下时“沿途民居、园圃、桑枳,必夷伐焚荡”^{[20]卷三十四,《兵卫志上》,P398}。

屯田、塘泺和林木,三者互相联结,相互补充,有水之处开塘泊、行屯田,无水之平原植桑榆,共同形成“不利骑战”^{[4]卷三百二十四,《李允则传》,P10481}的形势,构成了统一的防卫体系。保州州军虽小,却承担了屯田、塘泺、榆柳三项重任,成为宋朝备边部署时不可忽视的区域。

三、修葺边城,加强军情搜集

保州是宋辽边境的缘边诸州之一,战争的前沿地带。首先,澶渊之盟前,宋朝统治者为了收复幽云旧地,多次修筑河北城防。太祖乾德五年(965年),定州路承受李继宣奉诏“修长城口、平塞、威虏、静戎军、保州”^{[4]卷三百八,《李继宣传》,P10144}。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命保静军节度、幽州行营都部署刘遇护筑保州、威虏、静戎、平塞、长城五城^{[4]卷二百六十,《刘遇传》,P9031}。

澶渊之盟后,宋朝政府为避免引起宋辽纠纷,多次对外宣称要谨守盟约,不增筑城防,但私下仍对原有的城池不断修缮、积极巩固,加强边城工事,以防辽军的侵犯。如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上虑河北诸州缘兵罢遂弛备,诏敌楼、战棚有隳坏者葺之”^{[1]卷五十九,景德二年春三月丙寅,P1325}。同年,再次下诏增葺河北诸州军城池^{[1]卷五十九,景德二年夏四月己亥,P1329},将城防的修缮范围进一步扩大。为避免辽朝的外交干涉,景德四年(1007年),宋真宗下诏要缘边州军谨遵宋辽誓约,除准修葺州城,其他工役悉禁止施行^{[1]卷六十五,景德四年五月壬寅,P1455},此后河北诸州的城防工作暂时告一段落。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河北城防修筑工作恢复正常,赐河北州军修筑坊城工役的兵卒缗钱若干^{[1]卷一百四,天圣四年秋七月乙丑,P2414}。仁宗庆历七年(1047年),保州知州王中庸提举修葺保州等五州军堤道^{[1]卷一百六十,庆历七年五月乙酉,P3875}。

宋神宗时期更是多次命人修葺保州城。元丰二年(1079年),命定州路安抚司寻机修葺保州城,后安抚司奏请于元丰三年修筑保州城,神宗从之,并叮嘱定州安抚司要“止作帮贴,不得过为张望”^{[1]卷二百九十八,元丰三年五月己巳,P7267},避免引起辽朝的警觉与干涉。后宋神宗又以“保州增展关城,非久兴役,闻边上修城土工极为灭裂,无科直取准法度”为由,特命京城选“晓解土工小壕二人”,到保州指教工作^{[1]卷三百,元丰二年冬十月戊戌,P7306}。元丰三年(1080年)六月十二日,诏定州路安抚司从封桩库调三万绢帛钱作为修葺保州城的费用^{[1]卷三百五,元丰三年六月癸卯,P7422}。元丰四年(1081年),建雄军节度使、知定州韩绛回奏言保州城修葺完毕,故赐诏奖谕^{[1]卷三百十二,元丰四年夏四月己卯,P7570}。

其次,除修筑边城外,宋政府在宋辽边境的地势险要处设置了众多大小不一的砦、铺、堡,派少量兵卒

驻守,以加强边境巡逻。堡寨具有军事防御性质,控扼交通要道,限制两国人员往来^{[21]P211}。保州一路,平川旷野,地势平坦,利敌骑驰突,故设口铺“置沿边巡徼兵”^{[6]前集卷十六上,《边防》,第726册,P470},据《武经总要》记载,保州地区设有口铺六个,分别是子口铺、八角口铺(赵旷川口)、两岭口铺、狗号口铺、白道口铺、柏山口铺,每铺有“蕃汉十人”守把,住户五十至二百余家不等^{[6]前集卷十六上,《边防》,第726册,P476}。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诏:“保州山口置把截铺,每铺兵级十一人充巡子,月一易之,仍令长城口西巡检都大提举管勾。”^{[5]兵二七之二五,P7245}这些寨铺每铺相隔三四十里,距辽边境近者四五里,远着六七里,如子口铺至辽朝训口铺约五里,八角口铺至辽朝训口铺约四里,狗号口铺至辽魏家庄铺约七里^①。这些寨铺成为宋辽对峙的前沿地带,承担了侦查敌情、“屏奸诈、备缓急”的任务,又使塘泊的防御功能得到进一步提高,是宋朝对辽边防建设的重要一环^{[22]P451-458}。

再者,宋朝为了及时了解辽朝的动向,预先采取防御措施,在沿边州军设机宜司,命河北缘边安抚司负责招募使臣、百姓等人充当主管刺事人,专门负责搜集、探听辽朝的政治、军事情报。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募河北民谳契丹道路、勇锐可为间伺者,充疆人,无事散处田野,遇敌人寇,遣出塞偷斫贼垒^{[1]卷五十,咸平四年十二月甲午,P1102}。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缘边州军选募刺事人的分配名额为“广信、顺安军各四人,雄州、北平军各三人,霸州七人,保州、安肃军各六人”^{[1]卷二百九十九,元丰二年七月甲戌,P7267},情报收集后,各州军报雄州汇总。但时常发生各自独奏朝廷之事,如仁宗庆历二年(1024年),知保州王果得到辽朝聚集军队,欲夺取关南之地的消息后,立即上奏朝廷,请于广信军以西控守防御^{[1]卷一百三十五,庆历二年三月丁丑,P3120}。

综上所述,保州地处宋辽对峙的前沿地带,宋政府为防御辽军,在保州地区进行了较为周密的部署,采取了多方面的举措。首先,打破以文臣出任知州的惯例,以杨嗣、杨延昭等武将充任知州,并选有才能的宋朝官任通判、县尉之职,以弥补武臣知州的不足,文武守臣相互配合,以提高宋朝在对辽军事、外交中的能力。并设保州缘边都巡检司于此,以加强保州、广信、安肃三州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其次,充分发挥保州地区徐河、边吴淀、曹河等塘泊、河渠的优势,沟通鸡距泉、清苑河、徐河,恢复保州地区的漕运畅通,辅之开展军事屯田,广植桑榆,积极开展塘泺防御工程建设,成为边防“水上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再者,通过修葺城防,置口铺,加强沿边守备,并派遣刺事人及时获取敌方军情。通过这些措施,保州地区的防御部署不断加强,成为河北军事防御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对抑制辽军南侵起到重要作用,保州也成为宋朝边境防御部署时不可忽视的军事重地。

参考文献:

- [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 [2]林瑞翰.北宋之边防[C]//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宋史研究集(第十三辑).台北:台湾国立编辑馆,1981.
- [3]顾炎武.日知录校注[M].陈垣,点校.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
- [4]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5]徐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
- [6]曾公亮.武经总要[M]//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 [7]王存.元丰九域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8]王轶英.北宋澶渊之盟前的河北军事防御区域[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25-29.
- [9]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M].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 [10]马端临.文献通考[M].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
- [11]李克武.关于北宋河北塘泺问题[J].中州学刊,1987(4).
- [12]宋祁.景文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 [13]沈括.梦溪笔谈[M]//沈括全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①辽朝为了拓展疆土,在宋辽边境亦设置了多处寨铺,不时派人到宋朝境内,并不断往南移动寨铺的位置,以便为南侵作准备。据《长编》卷二百三十六,熙宁五年七月,第5751页。《武经总要》前集卷十六上《边防》,第726册,第476页。

- [14]杨 军.北宋时期的河北塘泊[C]//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侯仁之师九十寿辰纪念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
- [15]陈 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6.
- [16]陈 峰.北宋御辽战略的演变与“澶渊之盟”的产生及影响[J].史学集刊,2007(3).
- [17]马继业.宋代城池防御探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5.
- [18]程民生.北宋河北塘泺的国防与经济作用[J].河北学刊,1985(5).
- [19]王明清.挥麈录[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 [20]脱 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6.
- [21]曹家齐.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 [22]郭东旭,王轶英.北宋河北沿边的寨铺建设述略[C]//姜锡东,李华瑞.宋史研究论丛:第八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

An Analysis of Military Defense Measures for Baozhou District in the Song Dynasty

Wang Xiaolong, Du Jinghong

(Song History Research Center and College of History,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North Song Dynasty, Baozhou lies on the border of Song and Liao, north to Quangxin army, Ansu army, south to Qizhou, Yongning army, the special position made it a key city for defending the Song Dynasty though it only governed one county (Qingyuan). In order to maintain security of borders and defend invasion from Liao, the Song Dynasty chose excellent ministers and generals as local officers of Baozhou and set up margin inspection to enhance the cooperative engagement capability with neighboring states. It also extended cities, developed fields, connected ponds, planted elms to strengthen the defense capability of Baozhou district. All these measures made Baozhou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arts for the border-defensing system of Hebei and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maintaining defense security of the Song Dynasty and resisting invasion from Liao.

Key words: Song Dynasty; Liao Dynasty; Baozhou; military denfense; force minister

(责任编辑 张春生)